

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傳入——

1920-30年代韓國第一代中國現代文學家的文學思想

宋寅在*

摘要

本文探討1920-30年代三位韓國籍中國現代文學家梁健植（1889-1944）、丁來東（1903-1985）、金台俊（1905-1949）接納及介紹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情況。1915年開始的中國新文化運動，受到了同時期韓國知識分子的關注，其中在文學方面如新文學形式的出現、以文學的角度去認識現實、啟蒙等等思考，皆對1920-30年代韓國的文化、文學發展過程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在1920年代初梁健植帶著對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深刻認同，積極熱情地翻譯中國新文學作品，他希望他的翻譯能為韓國文學的成長及韓國的新文化建設做出貢獻。而丁來東在1923年，即新文化運動退潮之後，他到了中國留學，成為中國文學研究的專家，其特點是他與新文化運動保持著一定的距離並做出客觀評價。至於金台俊是在1930年代初到中國的，他看見當時文藝運動領導思想運動的現象，形成了其對新文化運動的認識，可是此後他傾向於無產階級文學，因此他轉而認為當時文學發展應該突破新文化運動，此為其特點所在。綜上可見，1920-30年代韓國知識分子通過接受與引介中國新文化運動，特別是中國的文學論述及文學作品，去呼應當時韓國文學的時代課題及使命，而韓國有關中國新文化

* 作者現任韓國翰林大學翰林科學院 HK 教授。

運動的話語，也在韓中的知識網絡基礎上逐漸形成，此即可作為近代韓中知識網絡並非斷絕或失效之線索與明證。

關鍵詞：新文化運動、知識網絡、梁健植、丁來東、金台俊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Culture Movement of China

—— Literature Thoughts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Sinologist of Korea in the 1920s and 1930s

In-jae Song*

Abstract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which started in China at 1915, led the reform of idea,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Yang Geonsik (1889-1944), Jung Naedong (1903-1985), and Kim Taejoon (1905-1949), who can be called as the first generation sinologists in modern Korea, had interest in it during 1920-30s. Especially, the birth of new writing style, perceptions of reality through literature, enlightenment in thoughts became the main references for them to seek the way for Korean revolution of literature, culture and thoughts. Yang Geonsik expressed sympathy with New Culture Movement of China deeply and therefore translated several volumes of novels and plays of modern China as he hoped Chinese literature can be helpful to the growth of literature and the revolution of ideas in modern Korea. Jung Naedong went to China to study after New Culture Movement declined. It made him evaluate New Culture Movement more objectively, although he also hoped to learn from Chinese literature. Kim Taejoon on the one hand witnessed literature movement

* HK Professor, Hallym Academy of Sciences, Hallym University

serving as useful means in social and ideological movement, but on the other hand regarded New Culture Movement as the past of current proletarian literature, all his views are based on socialist ideas. These three types of view constructed the multiple images of New Culture Movement of China in the 1920s and 30s Korea. All of these views are relevant to the effort of Korean intellectuals to accomplish the reconstruction of Korean literature. It can be important historical resources for describing the knowledge communication and network of Korea and China between the 1910s and 1930s.

Keywords: New Culture Movement, knowledge network, Yang Geonsik, Jung Naedong, Kim Taejoon

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傳入——

1920-30 年代韓國第一代中國現代文學家的文學思想^{*}

宋寅在

一、前言

本文探討 1920-30 年代韓國知識場域接受中國新文化運動及韓中知識交流的狀況，特別聚焦在第一代韓國的中國現代文學家梁健植（1889-1944）、丁來東（1903-1985）、金台俊（1905-1949）對於中國新文化運動的論述及看法，進而討論當時中國的文學、思想及話語對韓國的現實及學術上所產生之意義。

一般認為，隨著清國衰落，日本侵略朝鮮，20 世紀初朝鮮與中國之間的知識交流應遠比朝鮮時期微弱，比如金台俊在 1930 年代《東亞日報》中表示：甲午改革以來，朝鮮為了接受西方文化，突然切斷了三、四千年來與中國緊密的文化交涉，¹ 另也有學者研究表明：「在韓日合併、辛亥革命之後，朝鮮的中國文學翻譯即切斷了與明清白話小說及以梁啟超為代表的啟蒙文學之關係。人際關係、學術、文化方面的知識網絡到 19 世紀末，雖在東亞全域發揮了至大的思想影響力，可是到這一時期，事實上也

^{*}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of Korea Grant funded by the Korean Government (NRF-2007-361-AM0001).

¹ 天台山人：〈文學革命後의 中國文藝觀（一）——過去十四年間〉（〈文學革命後中國文藝觀（一）——過去十四年間〉），《東亞日報》第四面，昭和五年（1930）十一月十二日。作者按：「天台山人」是金台俊的號。

失去了現實力量。」²「跟合併以前比起來，在 1910 年代朝鮮的中國翻譯小說進入了萎縮局面。」³上述的變化實際上是伴隨著朝鮮人對於中國的認識變化而來。換言之，19 世紀以來朝鮮人在認識到西方列強與日本帝國主義等強大他者之後，就不再把中國看成是學習與合作的同伴，而是文明開化的落伍者、朝鮮近代化的障礙。⁴由上論述可見，近代東亞區域的秩序變化也連帶引起了知識網絡的變化。

若是我們考慮從殖民時期開始，日本即對韓國具有絕對優勢之影響力的話，一方面可以認同上述的看法，但另一方面卻不可輕易地贊同韓中知識社會突然絕緣、雙方知識網絡失效的說法，正如有關研究表明，1910 年代是韓國的開港時代，隨著鐵路、汽船帶來的交通革命，韓中兩國之間的流動空前的增加。⁵在韓日合併前後，柳麟錫（1842-1915）、朴殷植（1859-1925）、李炳憲（1870-1940）等一群儒家知識分子趕赴中國進行獨立運動及思想運動，由此可見，在日本於韓半島占有絕對強勢的影響力之後，中國即成為朝鮮人主要流亡地、獨立運動的主舞臺，產生了與以前不同形式的交流行動。

當我們再把視野轉換到韓中知識交流上來看，不難發現兩國知識網絡關係並未處於絕緣或微弱狀態。有關研究告訴我們，在進入開化時期後，韓國知識場域的興趣就開始傾向於西方理論與西方文學，導致引介中國文學家減少了；可是，迨至 1920-30 年代朝鮮接受外國文學的黃金時代

² 박진영 (朴珍英) : 〈한국 근대 번역문학사 성립의 기원과 역사성〉 (〈韓國近代翻譯文學史的成立的起源及其歷史性〉), 《탈경계인문학》 (《跨境界人文學》) 第 7 卷第 2 期 (2014 年 6 月), 頁 12。

³ 장노현 (張魯鉉) : 〈근대전환기 중국 매개 번역문학의 현황과 양상〉 (〈現代轉型中的中國翻譯文學現狀與模式〉), 《국제어문》 (《國際語文》) 第 56 卷 (2012 年 12 月), 頁 339。

⁴ 정문상 (鄭文祥) : 〈근현대 한국인의 중국 인식의 궤적〉 (〈近現代韓國人中國認識的軌跡〉), 《한국근대문학연구》 (《韓國現代文學研究》) 第 25 號 (2012 年 4 月), 頁 227。

⁵ 노관범 (盧官汎) : 〈1910년대 한국 유교지식인의 중국 인식－柳麟錫, 朴殷植, 李炳憲을 중심으로－〉 (〈1910 年代韓國儒家知識人的中國認識〉), 《民族文化》第 40 輯 (2012 年 12 月), 頁 7-39。

裡，中國文學轉而是這潮流的一部分，⁶ 這個時期，具有中國留學經驗的知識分子們戮力地引介中國的現代戲曲、小說等等。⁷ 有學者據此現象，把 1923-50 年看作是韓國的中國文化研究之黎明時期，⁸ 而黎明時期中的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則從 1931 年滿洲事變爆發後即開始萎縮，於 1937 年中日戰爭後衰落。⁹ 我們可以說日本的擴展主義，在跨越朝鮮半島進而擴大到中國之時，韓中的知識交流也在此刻產生新的轉折點。

根據以上論述，我們可以概括出目前韓國學界對於韓中知識交流大致趨勢的看法：自 19 世紀開始兩國知識網絡交流，即伴隨著清國的衰落、韓日合併、辛亥革命等事件開始消退，並形成了新形式的知識網絡，至中日戰爭時期，韓中知識網絡交流則變得更加衰歇。筆者認為上述的看法有待商榷，若是我們運用「轉變」的框架去描述 20 世紀初韓中知識交流現象，將比用「切斷」或「無力化」等框架去描述更為合理與準確。另外，筆者認為，以上的相關文章大部分只是介紹 20 世紀初韓中文學交流的大概狀況，因此要從更關鍵的立足點來觀察當時韓中文學交流的狀況及其意義。所以本文特別關注新文化運動的傳入歷史及其意義，藉以說明兩國近代思想在近代化過程當中形成了什麼關係，發揮了什麼意義。本文討論的中國新文化運動乃是當時韓中知識交流的重要成分，甚至新文化運動本身就是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努力建設「新」中國的產物，因此以新文化運動為媒介的知識交流，還可能保有內容上的「新」。那麼，韓國

⁶ 박남용 (朴南用)、윤혜연 (尹惠妍) : 〈일제 시기 중국 현대소설의 국내 번역과 수용〉 (〈在日本統治時期中國現代小說接受與翻譯情況〉)，《中國語文論譯叢刊》第 24 輯 (2009 年 1 月)，頁 305-325。

⁷ 박남용 (朴南用)、임혜순 (任惠淳) : 〈일제시기 중국 현대희곡의 국내 번역과 그 특징 연구〉 (〈日據時期中國現代戲劇的國內翻譯與接受〉)，《中國學研究》第 50 輯 (2009 年 12 月)，頁 429-459。

⁸ 박남용 (朴南用)、박은혜 (朴恩惠) : 〈金光洲의 중국 체험과 중국 신문학의 소개, 번역과 수용〉 (〈金光洲體驗中國以及介紹、翻譯、接受中國新文學〉)，《中國研究》47 卷 (2009 年 11 月)，頁 135。

⁹ 박진영 (朴珍英) : 〈중국문학의 발견과 전문 번역가 양건식의 초상〉 (〈中國文化的發現及專制翻譯家梁健植的影像〉)，《근대서지》(《現代書誌》) 第 10 號 (2014 年 12 月)，頁 219。朴南用、尹惠妍 : 〈在日本統治時期中國現代小說接受與翻譯情況〉，頁 321。

人怎麼瞭解中國新文化運動中克服國家存亡危機與追求生存的旨意呢？而中國新文化運動在 1920-30 年代的韓國知識場域中究竟呈現什麼樣的形象？又體現了什麼樣的意義呢？以上即為本文的討論重點。為了回答上述問題，本文將以梁健植、丁來東、金台俊的中國新文化運動論述及有關實踐為考察對象，這三個人在中國具有不同的觀察與體驗，而他們的新文化論述，形構成韓國當時之中國新文化運動的論述光譜，具有其意義且值得重新觀察。

二、從同時代意識來看新文化運動——梁健植

（一）積極翻譯中國現代文學與經由日本的重譯

1920 年 11、12 月梁健植在《開關》雜誌上連續發表〈以胡適氏為中心的中國文學革命〉一文，這是韓國歷史上第一次介紹中國文學革命的文章，¹⁰ 可是這不是梁氏自己的文章，而是自日本的中國戲曲學家青木正兒（1887-1964）之〈以胡適為中心的文學革命〉一文翻譯而來。¹¹ 此後，1922 年北旅東谷在《開關》第 30 號發表〈新東洋文化之建立〉一文，詳細介紹了胡適（1891-1962）〈文學改良芻議〉及陳獨秀（1879-1942）〈文學革命論〉等文章，北旅東谷在對這兩篇文章的評價中指出，胡適與陳獨秀的意見實刺激了韓國之文化運動並提供了相對參照點。¹² 而後 1923 年李

¹⁰ 김시준 (金世俊) : 〈한국에서의 중국현대문학연구 개황과 전망〉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在韓國的概況及展望〉)，《中國語文學誌》第 4 卷 (1997 年 12 月)，頁 1-8。轉引自朴南用、朴溫惠：〈金光洲體驗中國以及介紹、翻譯、接受中國新文學〉，頁 135。

¹¹ 青木正兒：〈以胡適為中心的文學革命 (胡適を中心に渦いてゐる文学革命)〉，《支那學》第 1 卷第 1-3 號 (東京：弘文堂，1920 年)，頁 11-26、32-130、199-219。

¹² 北旅東谷 (Bukryeodonggok) : 〈現中國의 舊思想、舊文藝의 改革으로부터 新東洋文化의 樹立에 : 他山의 石으로 現中國의 新文學建設運動을 이야기함〉 (〈從現中國的舊思想、舊文藝改革到新東洋文化之建立——談現中國的新文學建設運動作他山之石〉)，《開關》第三年第十二號 (總第 30 號)，京城府：開關

允宰（1888-1943）則是翻譯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一文，李氏在翻譯後指出他期待著胡適的主張能刺激崇拜陳舊腐敗之死文化的朝鮮人。¹³ 上述這些翻譯與寫作行動，實受到 1920 年韓國思想界的影響，1920 年《開闢》雜誌創刊，同年 10 月李敦化（1884-1950）發表了〈朝鮮新文化建設方案〉一文，提倡建設新文化，¹⁴ 這時中國新文化運動被奉若先例及參照點，而文學革命也受到關注。當時開闢社不僅介紹胡適的文學革命論，實際上也與胡適有所交流，如 1920 年 12 月即向胡適約稿，希望胡適能為《開闢》雜誌撰寫新年祝辭，胡適答應寄送〈祝《開闢》發展〉一文，梁健植指出自己正是在朝鮮最初與胡適交流的人，是由他寄信給胡適進行約稿的，¹⁵ 梁氏即是在上述脈絡中進行他在文壇的相關論述及活動。

梁健植所以積極的引介中國新文化運動至朝鮮之動機，實際上與北旅東谷和李允宰相似，就是想透過引介中國文學革命思想，促成韓國文學之進步。在介紹胡適之前，梁健植已抱有這種想法，1917 年 11 月他在《每日申報》發表了〈關於支那小說及戲曲〉一文，文中表明：「研究外國文學的目的就是為了資助自國文學的發達。」這裡梁氏所說的外國文學就是中國文學。梁健植還提出因為中國文學自三千年前就已傳入朝鮮，並具有深厚的根柢，因此若是不瞭解中國文學，就無法瞭解朝鮮文學。除此之外，梁氏還指出中國文學「具有一種特點，能於世界文壇顯示異彩」，與此同時，梁氏還認為中國文學是東洋文化之源泉，因此中國文學不僅在世界文

社，大正十一年（1922）十二月一日，頁 23-33。

¹³ 홍석표（洪昔杓）：〈胡適과 김태준의 문학사 서술의 특징 - 『백화문학사』와 『조선한문학사』를 중심으로〉（〈胡適與金台俊的文學史敘述的特徵——以《白話文學史》與《朝鮮漢文學史》為主〉），《中國語文學誌》第 22 輯（2006 年 12 月），頁 159-190。

¹⁴ 李敦化：〈朝鮮新文化建設에 대한圖案〉（〈朝鮮新文化建設方案〉），《開闢》第四號（京城府：開闢社）大正九年（1920）九月二十五日，頁 9-16。

¹⁵ 梁健植的書信收錄於胡適著，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 42 冊，合肥：黃山書社，1994 年。轉引自鄭宣景：〈양건식의 중국신문학운동 수용과 번역의 태도〉（〈梁健植對中國現代文學運動的接受與翻譯態度〉），《中國語文學論集》第 79 號（2013 年 4 月），頁 436。

學中具有獨特性，在東洋的範圍內也是。¹⁶ 綜上，梁健植認為中國文學是朝鮮文學的根基，是瞭解朝鮮文學的前提，是朝鮮文學能夠發達與否的養料。

梁健植希望能通過翻譯中國文學讓自己的美夢成真，藉由瞭解中國文學以促進朝鮮文學之發展，因此他在 1922 年翻譯了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 1828-1906）的《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1930 年 1、2 月翻譯了魯迅（1881-1936）的《阿 Q 正傳》共 24 次在《朝鮮日報》上連載。¹⁷ 而在開關社所發行的《中國短篇小說集·譯者序文》中，可看見他更為強烈地提出了閱讀中國文學的理由及其必要性：

朝鮮青年必須讀革命文藝，讀完後方能熱血沸騰，喊著「噢」一聲，從腐臭的生活中跳出來。於此同時，我堅決相信，朝鮮人的生長過程雖經歷了一段污穢坎坷的歷史，但其補償是，必然會誕生出大政治家、大文學家。……希望我的勤奮努力，讀者起碼會有一點點的感激。¹⁸

這一論述更具體地表現了中國文學在朝鮮所具備的意義，即得以刺激朝鮮青年的元氣，朝鮮青年可以在「刺激」與「感激」的基礎上，創造大政治、大文學，並克服疲敝的現實。而開關社也在《中國短篇小說集》中提到出版此書的緣由：「認識新興中國，為此讀這本書」——開關社說明了此小說集中所收錄的作品，都是中國處於更生苦難時期的產物，刻劃了當時中國青年的心境。由此我們可以瞭解到，文學革命雖是朝鮮引介中國新文化運動時的核心題材，但朝鮮知識分子關注點並非從文言文到白話文

¹⁶ 梁白華：〈關於支那小說及戲曲〉，《每日申報》第一面，大正六年（1917）十一月八日。收於梁健植著，南潤秀（남윤수）、朴在淵（박재연）、金榮福（김영복）編：《양백화문집》（《梁白華文集》）第 3 冊（서울: 강원대학교 출판부〔首爾：江原大學校出版部〕，1995 年），頁 159。

¹⁷ 梁白華譯：《諾威》（永昌書館，1922 年）；梁白華譯：《阿 Q 正傳》，《朝鮮日報》第三面，昭和五年（1930）一月四日至二月十六日。

¹⁸ 梁健植：〈譯者序文〉，收於李斗星：《中國短篇小說集》（京城：開關社，1929 年），頁 1。

的形式變革，而是白話文學對於現實的影響。

這樣，梁健植一邊介紹中國新文化運動，一邊積極熱情地翻譯著中國現代文學，呈現出中國文學為韓國文學的進步成為參照點的希望，而他是經由日本學界的視野去獲取與中國相關的知識，如上所述，像是〈以胡適氏為中心的中國文學革命〉就不是梁氏自己的文章，而是翻譯自日本的中國學研究相關文章。1922 年翻譯《玩偶之家》的時候，他參照了日文版，雖然他從 1918 年開始翻譯該書，還看到過《新青年》易卜生特號，可是他沒參照中文版本翻譯，而是憑藉兩種日文版與一種英文版去進行翻譯工作。¹⁹ 他的重譯經歷可上溯到 1918 年，當時他正在翻譯《紅樓夢》並連載於《每日申報》上，這時他參照的是 1916 年日本文教社版的《紅樓夢》。²⁰ 雖然他曾與中國直接交流過，比如寫信給胡適，但在實踐文學革命的理念上，卻大部分運用經由日本的重譯。

重譯在梁健植文學活動的地位，明顯地表現在他作品上。梁氏在 1930 年翻譯《阿 Q 正傳》連載於《朝鮮日報》的時候，不運用重譯，因為梁氏比日本更早翻譯該書，而正是在梁氏非重譯的此作品中，我們可以直接看見他翻譯上的問題。一位曾在北京留學 8 年的學人丁來東，一一對照《阿 Q 正傳》的中文原文與梁氏的韓語譯文，明確指出梁健植不少的誤譯。根據丁來東的說法，梁氏把「老婆」一詞翻譯成「祖母」。²¹ 雖然丁來東提出了這個疑問，但並未能立即確定梁氏犯了誤譯的問題，後經詢問了幾位中國朋友，才得出梁健植翻譯錯誤的結論。老實說，這是很簡單的中文常識，不需要多次諮詢也能確定梁氏的誤譯，因此，這件誤譯引起人們對於梁健植翻譯能力的懷疑。當我們考察梁健植的中國經歷時，雖然有一些記錄可能讓人覺得他曾去過中國留學，例如在《中國短篇小說集·

¹⁹ 朴珍英：〈韓國近代翻譯文學史的成立的起源及其歷史性〉，頁 23。

²⁰ 朴珍英：〈韓國近代翻譯文學史的成立的起源及其歷史性〉，頁 23。

²¹ 梁健植：〈失敗珍談，내가 第一 장피하던 일 - 筆談하다 大失手〉（〈我最丟臉的經驗——筆談大失誤〉），《別乾坤》第 11 號，1928 年 2 月 1 日，頁 88-89。

譯者序文》中出現一句他曾「在北京平民大學」，²²1926年在《東光》雜誌上發表〈留學十年〉一文，²³這是梁健植可能留學中國的相關根據，可是平民大學是否存在是值得商榷的，又〈留學十年〉一文並非梁氏回顧自己的留學生活，而是抒發希望自己能夠留學中國的情感，文中提到如果能回到20歲，他想去中國留學。另一個例子也加強了他並未具有留學中國經歷的懷疑，有次梁健植去奉天，曾試圖跟警察、人力車夫筆談，可是卻失敗了，這些事件都證明梁氏的中文程度並非很高。

綜上可見，雖然梁健植對於譯介中國文學帶有高度熱情，且具有同時代意識，但梁氏自己在接受與理解中國白話文的方面卻跟不上他的熱情。梁氏對《阿Q正傳》的翻譯，正顯示出他的譯介熱情與翻譯能力間是有落差，也因此日文譯本成為他介紹中國文學的橋樑與手段。

（二）思想革命與文學革命的結合

在這節中我們將更深入梁健植在介紹新文化運動時的思想觀點。梁氏在殖民地朝鮮中介紹中國的文學革命，實帶著明顯的目的，他不只看文體改革、文學體裁創新，相比之下，梁氏更注意思想革命與文學革命之間的關聯性。梁氏在1922年以筆名梁白華分十三回連載發表的〈中國的思想革命與文學革命〉一文中明顯地表示了他的看法，這也是翻譯自日本雜誌《日本及日本人》中的文章，²⁴梁氏在開始連載此文時，曾說明連載旨意：

作者自譯：從某種角度來看，中國所發生的事情與韓國類似，在思想、道德、社會組織、政治程度等方面，甚至是處於啟蒙時期，以及正在醞釀革命運氣等方面皆是如此。建設新中國的過程會跟建設新朝鮮的過程類似，舊中國破壞，舊朝鮮亦破壞，這是同一的命運。因此，我們對於新中國運動具有多大的興趣，就表示我們對青年革

²² 梁健植：〈譯者序文〉，收於李斗星：《中國短篇小說集》，頁1。

²³ 梁健植：〈留學十年〉，《東光》第8卷，1926年12月，頁15-16。

²⁴ 據梁氏說，原文刊登於《日本及日本人》大正十一年（1922）7月號。

命運動有多熱烈的同情。²⁵

歸結梁健植的看法是中韓兩國具有類似性，都處在破壞舊國家，進以建設新國家的過程，因此朝鮮人必須瞭解中國的革命運動，這段話是在韓中知識交流進入新階段的脈絡上提出的。上溯到 19 世紀末，當時朝鮮人對於中國形象是帶有否定性的，比如文明開化的落伍者、朝鮮近代化的障礙、東亞病夫……等等，可是通過梁健植的言論，中國又重新成為成就革命的同伴。可是，這裡所說的革命不是政治革命，因為中國已經經歷過政治革命，但在政治革命後社會卻還沒有根本性的變化，所以才以其它領域的革命作為一種出路，這就是〈中國的思想革命與文學革命〉一文生發的歷史語境。

梁氏所翻譯的〈中國的思想革命與文學革命〉一文中引用了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說，提出僅有政治革命不足以導致任何變化，不能獲得任何效應，中國的當務之急乃是思想革命與文學革命。接著，此文將陳獨秀看成是思想革命的先驅，將胡適看成是文學革命的先驅，並指出陳獨秀的反儒家言論，實際上是在抵抗策劃復辟的政府。關於文學革命部分，則是介紹了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與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之內容及當時兩人交流的情況。此文作者特別強調，思想革命與文學革命不是兩回事，新思想必須以白話文發表才不會引起誤會，在這裡新文化被看成是表現新思想的載體，而非文學本身。〈中國的思想革命與文學革命〉一文表示，五四運動時期各種政治宣傳文用白話書寫的形式，實現了白話文體與愛國心的結合，這是個好例子，而在同樣的觀點下，文章最後結論如下：

作者自譯：思想革命產生了文學革命，誰也不知道文學革命會產生

²⁵ 梁白華譯：〈中國의思想革命과文學革命〉（〈中國的思想革命與文學革命（一）〉），《東亞日報》第一面，大正十一年（1922年）八月二十二日。中國이 어너點으로觀察하면우리朝鮮과事情이比等하다. 그思想에在하야 道德에在하야 社會組織과 政治程度에在하야 더욱히啓蒙時代에處한것과 革命의氣運이醞釀하는點에在하야 그러하다. 新中國이建設되는過程이新朝鮮의建設되는過程과比等比等할것이오 또舊中國의破壞되는것이亦舊朝鮮의破壞되는것과同一한運命을經過할 것이다. 그러기에 우리는新中國運動에對하야 多大한興味를有하야 青年의革命運動에對하야 深烈한同情을表한다.

文字革命、國語革命。但是，的確新人用新表現工具著述新思想。中國國語還沒成立，但從此會成立。「從此」表現悲觀嗎？把「已經」跟「從此」比較起來，吾人倒覺得中國多有希望。（完）²⁶

雖然，〈中國的思想革命與文學革命〉一文是梁氏翻譯自日人的文章，但卻有以該文寄託自己期盼的現象，梁氏試圖結合思想革命與文學革命，藉以實現建設新國家的希望寄託於其翻譯文章之中。

往後，梁氏持續地翻譯有關文章，如〈最近五十年的中國文學〉是討論中國的文學革命，²⁷他覺得因為朝鮮跟中國文學的交涉不少，中國文學值得閱讀。1930年他發表了自己的文章〈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一文再論新文化運動，²⁸此文反映著梁氏對於中國文學革命的瞭解，特別關注「言文一致文學的新建設」。文中介紹了胡適的看法，並且結合了陳獨秀、錢玄同（1887-1939）、蔡元培（1868-1940）普及言文一致運動的進程，描述了五四運動通過白話文增強了自身的影響力，並且指出新潮社與新青年社的創作活動，實造成了中國思想界與文學界的大革命。這是梁健植經歷多次翻譯的成就，即濃縮地描述了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進程，對於思想革命與文學革命的緊密性主張加深了系統性。

²⁶ 梁白華譯：〈中國的思想革命與文學革命（十三）〉，《東亞日報》第一面，大正十一年（1922）九月四日。思想革命은文學革命을産하였다 그리고文學革命은‘文字革命’‘國語革命’을産할ნი지도亦未知이다. 그러나如間新人이新思想을新表現의工具로著述하는 것만은確實하다 中國은아즉國語도成立되지못한나라이다. 只今으로부터될터이다 ‘只今으로부터’라는말이 그러면悲觀할것인가·벌써’라는말과 ‘只今으로부터’라는말을比較하여보면 吾人은 오히려中國에希望이만흔것을覺하겠다.

²⁷ 胡適撰，梁白華譯：〈最近五十年的中國文學（一）〉（〈最近五十年的中國文學（一）〉），《東亞日報》第五面，大正十二年（1923）八月二十六日。

²⁸ 梁白華：〈文學革命에서 革命文學〉（〈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東亞日報》第十二面，昭和五年（1930）四月一日。

三、退潮以後觀察新文化運動——丁來東

(一) 在中國文壇的現場

丁來東被稱為第一代韓國中國現代文學家，1945年韓國解放以後有相當長的時間都在大學的中文系任教。雖然他在任教期間大部分是研究中國古典文學，可是解放以前經常發表文章介紹現代中國文學與文學家，對於1920-30年代韓國人瞭解中國、中國文學卓有貢獻。丁來東與梁健植不同，丁氏到中國留學的時間相當長，親自體驗了1920年代的中國文學界。丁氏去中國前曾經在日本學習，本來打算繼續留在日本學習，但為了迴避關東大地震以後日本人對韓國人的迫害，因此從1924年秋天就轉往北京學習，當時韓國留學生總數是300多名，直到1932年5月丁氏回國，他一共在中國學習了8年。從某個角度來看，丁來東是被時局逼著去中國的，因此他成為中國專家也算是殖民地歷史的產物。雖然丁氏考上民國大學英文系，但是從入學的時候就對中國文學，特別是中國的新文學、白話文學感興趣。當時他的想法是這樣的：來中國不學中國固有的，只學外國的學問，並非明智的行為。²⁹ 他具有抱負，同時學成了英文與中文。

「活生生的現場性」是丁來東對於中國知識的來源與基礎，在留學期間他有機會跟胡適、周作人（1885-1967）……等著名文人間接或直接接觸，多次聽過魯迅、冰心（1900-1999）的演講。他回顧說：「在幾乎100名中國新文學文人當中，見過20多名，其中覺得值得介紹的有10多名」。³⁰ 1935年他向《東亞日報》投稿文章，介紹自己見過或聽過講座的六名文人：魯迅、胡適、周作人、冰心、鄭振鐸（1898-1958）、劉復（1891-1934），文章的標題是〈中國文人印象記〉。³¹ 其中關於胡適的描

²⁹ 정래동(丁來東)：〈서〉(〈序〉)，《정래동전집(2)》(《丁來東全集(二)》) (서울：금강출판사〔首爾：金剛出版社〕，1971年)，頁3。

³⁰ 丁來東：〈中國文人印象記〉(중국문인 인상기 〈(一)〉)，《東亞日報》第三面，昭和十年(1935)五月一日。

³¹ 丁來東〈中國文人印象記〉在1935年5月1日到8日一共七次連載。

述是這樣的：「才氣與精力橫溢的文人或學者」，³² 雖然身材比他預料的還矮小，可是令人留下強烈的印象。根據丁氏文章指出，當他要對胡適進行採訪的時候，胡適聽到丁來東曾在韓國介紹自己的〈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一文後，便愉快的接受採訪並回應。丁氏在〈中國文人印象記〉一文中還提出了對參加白話文運動作家們文章的感覺，比如魯迅和周作人雖然選擇了白話文體，但他們的文章卻比古文還難讀，這就是一種學外語的留學生很容易有的感覺。

在看丁來東的經歷時，我們要注意到他體驗中國文壇的時期。丁來東進入中國時，當時中國新文化運動已經進入退潮期，甚至所謂反新文學的論調也出現了。代之，革命文學逐漸興起，當時無產階級文學也在韓國、日本文壇比較流行，上述語境即是丁來東與梁健植之新文化運動論述產生區別的關鍵契機。換句話說，我們可以看見丁來東的新文化運動觀會具有一個轉變過程：1931年〈魯迅及其作品〉一文首次介紹魯迅是「實踐中國文學革命者」，³³ 並提及轉變後的魯迅，成為當時中國出版界的話題；³⁴ 1935年發表的〈中國文人印象記（三）〉則提出魯迅是「已經左傾的文人」。³⁵

丁氏還借用了中國文人的說法指出新文化運動的退步，如1934年他在連載於《東亞日報》的〈對國故整理的諸說〉最終回譯介成仿吾（1897-1984）〈國學運動的我見〉一文，在譯文中丁來東指出：「氏提出中國新文化運動以後的三階段變遷說，大部分沒有那麼成功，反而退步，甚至有不少弊害。」³⁶ 成仿吾對於新文化運動的評價是在1923年提出的，那時新

³² 丁來東：〈中國文人印象記（二）〉，《東亞日報》第三面，昭和十年（1935）五月二日。

³³ 정래동（丁來東）：〈魯迅及其作品〉（〈魯迅과 그의作品〉），《정래동전집(1)》（《丁來東全集（一）》）（서울：금강출판사〔首爾：金剛出版社〕，1971年），頁298。

³⁴ 丁來東：〈魯迅及其作品〉，《丁來東全集（一）》，頁302。

³⁵ 丁來東：〈中國文人印象記（三）〉，《東亞日報》第三面，昭和十年（1935）五月三日。

³⁶ 丁來東：〈中國의「國故」整理에 대한 諸說（完）〉（〈對國故整理的諸說

文化運動幾乎結束了。當年鄭振鐸也評價新文化運動說：「新文學的運動不僅要在創作與翻譯方面努力，而對於一般社會的文藝觀念，尤須徹底地把它改革過。新文學運動並不是要完全推翻一切中國固有的文藝作品。一方面在建設我們的新文藝觀念，創作新的作品，一方面卻要重新估定或發現中國文學的價值。」³⁷ 他們的看法發表後過 10 年，丁來東才將其觀點譯介紹韓國人。

（二）關於中國新文學的事後介紹與評價

丁來東肯定了中國新文學在韓國知識場域中的意義，他依據的是中國文學具有悠久歷史，中國形勢與韓國相似，因此多有值得注意之處。³⁸ 丁氏還強調了接受外國文學（包括中國文學）之必要性，他提出「具體且全面地接受外國文學，乃是朝鮮進展的當務之急」。³⁹ 關於文學革命的效應，丁氏注意到中國新文學運動的說法——對比活文學與死文學的論述結構，並表示同感，他還證明了當時韓國知識界承認中國文學在韓國具有一定的意義，其言道：

作者自譯：在我國的三一運動與中國的五四運動後，我國的言文一致運動取得相當高的成果，當時中國從五四運動轉換到文學革命，進而發展為白話運動。因此，我國新文學的發展與中國白話文學的進程具有不少的相似性，所以對於彼此都有很大的興趣，並且我國

（完）》，《東亞日報》第三面，昭和九年（1934）十一月十三日。原文為成仿吾：〈國學運動的我見〉，《創造週報》第 28 號（上海：創造社，1923 年 11 月 18 日）。收於《創造週報全年彙刊》第二集（上海：泰東圖書局，1929 年 8 月 3 版），頁 17-19。

³⁷ 鄭振鐸：〈新文學之建設與國故之新研究〉，《小說月報》第 14 卷第 1 期，1923 年 1 月。

³⁸ 丁來東：〈文壇肅清과 外國文學輸入의 必要（四）〉（〈文壇肅清以及外國文學輸入之必要（四）〉），《東亞日報》第三面，昭和十年（1935）八月七日。

³⁹ 丁來東：〈文壇肅清以及外國文學輸入之必要（四）〉，《東亞日報》第三面，昭和十年（1935）八月七日。

報社、雜誌社皆優待筆者所寫中國文學介紹這一類的文章。⁴⁰

值得注意的是，丁氏除了指出中韓兩國形勢的類似性外，還提及韓國語文一致運動與中國白話文運動的共同點。當時韓國已經進行了相當程度上的文學形式改革運動，因此在接觸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時候，主要興趣是放在文學本身或文學觀念的轉變上；另一個關注點是，當時韓國的期刊看重有關引介中國文學的文章。從上述丁氏的回顧中證明了在《開闢》雜誌開始對中國新文化運動表示興趣後，韓國文壇對於中國文壇的興趣並未中斷的延續下來，而在這語境下，丁來東也發表了不少文章，但他的文章在韓國戰爭時期幾乎被焚燒殆盡。⁴¹

在丁來東的新文化運動論述中，魯迅、胡適還以核心人士的角色出現。丁氏指出，胡適因為在留學期間接觸了世界性言文一致的趨勢，所以提倡文學革命，⁴²胡適、陳獨秀是文學革命的提倡者，而魯迅是文學革命的實踐者。⁴³更深入地說，魯迅熟練地運用白話寫小說，既不贊美舊思想，又不襲用舊小說的形式，而是全面創用新形式、新內容、新體裁，這在中國文壇內是獨一無二的。⁴⁴

關於胡適的白話文則比魯迅更接近於日常語言，胡適只是提倡者，不是創作家。比如丁氏評價胡適《嘗試集》說：「這只是一種試驗，用白話文也可以作詩，只是作品性沒有那麼好。」⁴⁵相比之下，丁氏對胡適的散

⁴⁰ 丁來東：〈魯迅及其作品〉，《丁來東全集（一）》，頁 302。筆자가 中國에 留學한 것은 우리나라 三.一運動 後요, 中國의 五.四運動 後이다. 따라서 우리나라에서는 語文一致의 運動이 상당한 成果를 거두고 있었으며, 中國에서는 五.四運動에서 文學革命으로 方向을 돌려서 白話文運動으로 발전하던 時機이었다. 따라서, 우리 나라 新文學의 發展과 中國의 白話文學의 進度는 비슷한 점이 많다. 그런 만큼 彼此의 關心은 컸으며, 筆者의 中國文學 紹介文 같은 것도 우리나라 紙, 誌에서는 우대해 주었다.

⁴¹ 丁來東：《丁來東全集（一）》，頁 4。

⁴² 丁來東：〈中國現文壇改觀〉（〈當今中國文壇概述〉），《丁來東全集（二）》，頁 63。

⁴³ 丁來東：〈魯迅及其作品〉，《丁來東全集（一）》，頁 298。

⁴⁴ 丁來東：〈魯迅及其作品〉，《丁來東全集（一）》，頁 298。

⁴⁵ 丁來東：《丁來東全集（二）》，頁 63。

文與講話的評價較好：「沒有贅餘的句子，沒有繁冗難解之處。他首次提倡使用白話文不用典故，他的文章也表現出實踐了自己的方針。他講話講得跟文章相似。」⁴⁶ 由此可見，丁來東高度評價胡適作為文學革命的提倡者，正努力的實踐言行一致。

如上所述，丁來東親自體驗過中國新文壇的氣氛，介紹了中國新文化運動的趨勢。回國後，他翻譯了魯迅的〈過客〉，指出了梁健植翻譯的錯誤……等，並且作為留學派的中國文學專家進行了不少翻譯、評論活動。在 1939 年還參加過關於朝鮮新文學的性情的座談會，表示希望參照中國文學去建設朝鮮新文學，他自己也打算在瞭解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基礎上，對韓國文學發展做出貢獻。

四、文學觀之轉變，對無產階級文學的憧憬——金台俊

金台俊以作為《朝鮮漢文學史》（1931）與《朝鮮小說史》（1933）的作者而著名，在著述的時候，他一邊整理朝鮮的文學家，一邊介紹從新文學運動時期到 30 年代的中國文學。⁴⁷ 根據金氏回顧，他在京城帝國大學學習中國文學時，在文學概念上就經歷過所謂的「天翻地覆的思想變遷」，這對他有著非常強烈的衝擊，並且為他對文學概念的認識帶來了變化。因為考入大學之前，他只有學過漢學，當時的文學只是四書三經而已，可是他在大學時期，於英文學、德文學、俄文學、日文學等各國的文學框架內，學到了戀愛小說、戲曲、評論、故事書籍、歌曲……等。他在 1930 年夏天為了調研畢業論文的資料，初次去了中國，他為考察明清時期戲曲史去了北京琉璃廠，但是一無所得。可是在這次中國之旅中，他卻獲得了沒預

⁴⁶ 丁來東：〈中國文人印象記〉，《丁來東全集（二）》，頁 136。

⁴⁷ 天台山人：〈文學革命後의 中國文藝觀——過去十四年間〉（〈文學革命後中國文藝觀——過去十四年間〉），《東亞日報》各日第四面，昭和五年（1930）十一月十二日至十四日、十六、十八、二十日、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十二月二日至十二月八日。

料到的結果——認識到中國新文學。此後，他覺得「中國只有在建設路途上的新文學，而中國文學研究的使命非在新文學的輸入、介紹、翻譯不可。」⁴⁸ 因此他希望能跟梁健植、丁來東、馬堯（生卒年不詳）合作翻譯中國新文學。他在研究中國文學的過程中，還對中國的歷史學、經濟學饒有興趣。因此，他讀了《中國社會史論戰》、⁴⁹ 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李季批評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等著作，他根據這一些知識，打破了過去僅局限於四書三經的文學框架。

1930年金台俊在《東亞日報》連載了〈文學革命後의中國文藝觀——過去十四年間〉，在連載第一篇中具體地說明了介紹中國現代文學的動機。金氏指出他在北京看到了一些傳單，上面宣傳著打倒軍閥、進行思想革命、打破封建思想、打倒帝國主義……等。⁵⁰ 他覺得這代表著中國的變化，並且在心裡思忖著：「中國放棄孔子已經很久了」，因而有了介紹中國文藝觀之變化現象的想法，他指出：

作者自譯：我明明白白地覺悟到，文藝運動力量引起了時局變化。主觀上，我希望傳達激變中國當中的各種真相，實際上，我性格粗暴，筆力拙劣，因此不敢描述它。所以退一步概觀領導中國革命的文藝運動。⁵¹

⁴⁸ 以上詳見金台俊：〈外國文學專攻의辯(6)：新文學의翻譯紹介〉（〈外國文學專攻之辯(六)——翻譯介紹新文學〉），《東亞日報》第三面，昭和十四年（1939）十一月十日。

⁴⁹ 《中國社會史論戰》，由上海神州出版社彙集 1931 年 8 月至 1933 年 4 月在王禮錫主編的《讀書雜誌》「中國社會史論戰」專欄中八十餘篇代表性的文章，以專輯形式共出版四輯。

⁵⁰ 金台俊：「爾清一切軍閥，行動要紀律化，生活要平民化，工作要科學化，思想要革命化，遵從總理遺教，信仰三民主義，擁護國民黨，剷除封建思想，打倒帝國主義。」見天台山人：〈文學革命後의中國文藝觀（一）——過去十四年間〉，《東亞日報》第四面，昭和五年（1930 年）十一月十二日。

⁵¹ 天台山人：〈文學革命後의中國文藝觀（一）——過去十四年間文學革命〉，《東亞日報》第四面，昭和五年（1930）十一月十二日。이처럼 시국을 변하게 한 것은 확실히 문예운동의 힘인 줄 깨달았다. 猫眼같이 격변하는 중국의 진상을 무엇으로든지 즉시 고국에 알려드리고 싶었으나 성질이 粗懶함과 필력이 그를 표현하는 데는 너무 侏劣함으로 일보 물러가서 중국혁명을 리드하여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領導中國革命的文藝運動」一句，金氏覺得中國的激變基底是有文藝這一層次的。對他而言，「文學」已從四書三經的文學框架中突出，經過了各種創作層面，最終上升到了領導社會變革的高度，因此他提出了「藝術是反抗的產物」、「文學是宣傳」等看法，認為藝術是社會變革、革命的工具。

〈文學革命後의中國文藝觀〉的結構如下：（一）黎明期以前的先驅。（二）文學革命從提倡到成功；（三）中國的翻譯界；（四）新詩運動的今昔；（五）文學研究會的功績；（六）創造社的奮鬥的光榮歷史。其著述參照多種有關研究：瀨沼三郎（生卒年不詳）《支那の現代文藝》、青木正兒《支那近世戲曲史》、王國維《宋元戲曲史》、《胡適文存》、《白話文學史》、譚正璧（1901-1991）《中國文學進化史》、錢杏邨（1900-1977）《中國現代文學作家》、陳源（1896-1970）《西滄閒話》、李何林（1904-1988）《中國文藝論戰》、《新青年》……等。⁵²

新文化運動是在〈文學革命後의中國文藝觀——過去十四年間（四）〉一文中黎明期以後的部分開始進行論述的，主要介紹運動的主將們投身於新文化運動的動機，係在辛亥革命失敗及遭受帝國主義壓迫的雙重難題語境下，知識分子提出以民主與科學主張進行各方面改革。此外，金氏還界定了文學革命，即為否定舊文學，換句話說就是革古文文學之命。⁵³ 金氏在文中也描述了新文化運動的進程如下：

1918年《新青年》全面使用白話。陳獨秀的《每週評論》、北大學生的《新潮》，此後北京的報刊、白話詩、散文詩都全用白話，確定了白話的勝利。此後，五四運動爆發、六三事件發生，全國皆逼迫政府，罷免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人，各地學生團體急激

오는 문예운동을 개관코저 함이다.

⁵² 홍석표（洪昔杓）：《근대 한중 교류의 기원—문학과 사상 그리고 학문의 교섭》（《近代韓中交流的起源——文學、思想、學術之交流》）（서울：이화여자대학교출판부〔首爾：梨花女子大學出版部〕），2015年），頁121。

⁵³ 天台山人：〈文學革命後의中國文藝觀——過去十四年間（三）〉，《東亞日報》第四面，昭和五年（1930）十一月十四日。

地發行無數的白話報刊，一年達到四百餘種，這個時期好像是在朝鮮己未運動之後，白話完全征服了中原。⁵⁴

金台俊的論述表明中國新文化運動超越了知識分子的話語、文學創作，帶來了廣泛的社會運動，這種論述跟文學先導變化的看法相通。金氏的興趣不停止於白話文運動，他很快轉換到帶著革命目的性的文學，即無產階級文學，特別是創造社從藝術至上主義轉化到社會主義。他描述創造社的文學活動說：「曾經站在無產階級文學與革命文學的共同戰線發揮了巨大力量，可是受到南京政府壓迫，1929年7月封閉了有著十年的燦爛歷史。」⁵⁵此後，金氏積極對無產階級文學表示興趣，還引用蔣光慈（1901-1931）的看法定義「革命文學」，指出革命文學是從被壓迫群眾出發的文學，反抗一切舊勢力，是認識現代生活，提出社會生活的新出路。金氏在1930年3月聽到中國左聯成立的消息後，參照瀨沼三郎《中國的現代文藝》一書說明了中國無產階級文學的發展階段。

金台俊認同無產階級文學，還介紹了中國無產階級文學集團與魯迅的矛盾，他表示贊同無產階級文學集團。當時金氏介紹錢杏邨〈死去了的阿Q時代〉一文，肯定了錢杏邨文中「中國人已經覺悟了，已經不像以前的阿Q了」的看法，甚至還表示與當時無產階級文學集團批評魯迅還在小資產階級取向有所共鳴，他們引用魯迅文集的名稱諷刺魯迅的文學進路，從吶喊，徬徨在野草的歧路，畢竟走向墳墓。⁵⁶除此之外，金台俊對無產階級文學提出樂觀看法：呻吟在水平線下的社會狀況、中國所經歷的體驗及苦難具有足夠的偉大文學題材，並且現在中國作家當中壯年、青少年人

⁵⁴ 天台山人：〈文學革命後の中國文藝觀——過去十四年間（三）〉《東亞日報》第四面，昭和五年（1930）十一月十六日。

⁵⁵ 天台山人：〈文學革命後の中國文藝觀——過去十四年間（八）〉，《東亞日報》第四面，昭和五年（1930）十一月二十六日。

⁵⁶ 天台山人：〈文學革命後の中國文藝觀——過去十四年間（十四）〉，《東亞日報》第四面，昭和五年（1930）十二月四日。

士多，將來肯定能產生優良新文學。⁵⁷總之，在金台俊的思路中，新文學運動的終點站就是無產階級文學，他認為這是當時「世界文壇的巔峰」。

五、結語

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核心問題意識是建設新時代。白話文通過新文化運動提高了其地位，成為了文學的新形式、新思想的載體。這種在形式、內容方面的特點助成了時代使命的轉換。對 1920-30 年代韓國知識分子梁健植、丁來東、金台俊來說，他們是通過新文化運動去認識新文化，進而反思轉型期韓國的文學與社會。他們從各自不同的角度去觀察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因此他們的新文化論述呈現出分歧的現象。梁健植認為，中國新文化運動是建設朝鮮新文學的養料，是使朝鮮青年覺悟的主要媒介，因此他積極翻譯中國新文學作品及有關文章。丁來東則是從新文化運動指出了朝鮮與中國處於類似處境，因此覺得中國文學可作為建設朝鮮新文學時的參照點，並且因為丁氏是在新文化運動退潮後才認識到中國文壇，所以他能夠客觀與遠距地談論新文化運動的利弊及其往後的歷史發展。而對金台俊來說，新文化運動是認識文學的社會作用的關鍵，他參照了中國文學史撰寫朝鮮文學史，金氏的終極文學取向是無產階級文學，因此新文化運動對他來說，就是無產階級文學過去所克服的一個對象。雖然三人各有各的看法及時間點，但是仍有共同點及相互之間的同仁意識，他們都希望協力透過引介中國文學做出對韓國文學進步與近代化的貢獻。可見，20 世紀初中國文化確實對於韓國文學界具有不少影響。

如上所述，在 1920-30 年代韓國文壇接受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過程中，得以證明當時確實存在著韓中知識網絡，特別的是在韓中知識網絡中，中國的文學話語與創作在韓國人應對時代使命的過程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⁵⁷ 天台山人：〈文學革命後の中國文藝觀——過去十四年間（十八）〉，《東亞日報》第四面，昭和五年（1930）十二月八日。

有另外一個例子，在 1930 年代朝鮮研究流行的時候，有位知識分子申南澈（1903-?）提到胡適的學術活動時，論及了〈文學改良芻議〉、《中國哲學史大綱》在中國的民族主義國學運動中做出了不少貢獻。申南澈的言論呈現了另一種發生於韓中知識分子間的共鳴，⁵⁸這也是探索當時韓中知識網絡的重要線索之一。這些線索與實例為我們提出研究新課題，即應當更為深入的探索於韓日合併與中日戰爭之間所存在的韓中知識網絡，因為這個網絡絕非處於斷裂、失效的狀態，而是一直存在且持續發生效用的。

⁵⁸ 신남철 (申南澈) : 〈최근 조선연구의 업적과 그 재출발—조선학은 어떻게 수립할 것인가〉 (〈最近朝鮮研究的業績及重新開始——該怎麼建立朝鮮學〉)，收於신남철 (申南澈) 著，정중현 (鄭鍾賢) 編：《신남철 문장선집 I》 (《申南澈文章選集 I》)，(서울：성균관대학교출판부 [首爾：成均館大學出版部，2013 年])，頁 203。

徵引書目

- 丁來東：〈中國의 「國故」整理에 對한 諸說(完)〉(〈對國故整理的諸說(完)〉)，《東亞日報》第三面，昭和九年(1934)十一月十三日。
- 丁來東：〈中國文人印象記〉(〈중국문인 인상기〉)，《東亞日報》各日第三面，昭和十年(1935)五月一日至五日、七日至八日。
- 丁來東：〈文壇肅清과外國文學輸入의 必要(全4回)〉(〈文壇肅清以及外國文學輸入之必要〉)，《東亞日報》第三面，昭和十年(1935)八月二、四、六、七日。
- 天台山人：〈文學革命後의中國文藝觀——過去十四年間〉(〈文學革命後中國文藝觀——過去十四年間〉)，《東亞日報》各日第四面，昭和五年(1930)十一月十二日至十四日、十六、十八、二十日、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十二月二日至十二月八日。
- 北旅東谷(Bukryeodonggok)：〈現中國의舊思想、舊文藝의改革으로부터 新東洋文化의樹立에：他山의石으로現中國의新文學建設運動을 이악 이함〉(〈從現中國의舊思想、舊文藝改革到新東洋文化之建立—談現中國的新文學建設運動作爲他山之石〉)，《開闢》第三年第十二號(總第30號)，京城府：開闢社，大正十一年(1922)十二月一日，頁23-33。
- 成仿吾：〈國學運動的我見〉，《創造週報》第28號，上海：創造社，1923年11月18日。收於《創造週報全年彙刊》第二集，上海：泰東圖書局，1929年8月3版，頁17-19。
- 李敦化：〈朝鮮新文化建設에對한圖案〉(〈朝鮮新文化建設方案〉)，《開闢》第四號，京城府：開闢社，大正九年(1920)九月二十五日，頁9-16。
- 金台俊：〈外國文學專攻의辯(6)：新文學의翻譯紹介〉(〈外國文學專攻之辯(六)——翻譯介紹新文學〉)，《東亞日報》第三面，昭和十四年(1939)十一月十日。
- 青木正兒：〈以胡適爲中心的文學革命(胡適を中心に渦いてゐる文學革命)〉，《支那學》第1卷第1-3號，東京：弘文堂，1920年，頁11-26、32-130、199-219。

- 胡適撰，梁白華譯：〈最近五十年의中國文學（一）〉（〈最近五十年的中國文學（一）〉），《東亞日報》第五面，大正十二年（1923）八月二十六日。
- 胡適著，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合肥：黃山書社，1994年。
- 梁白華譯：《諾威》，永昌書館，1922年。
- 梁白華譯：〈中國의思想革命과文學革命〉（〈中國的思想革命與文學革命〉），《東亞日報》各日第一面，大正十一年（1922）八月二十二日至八月二十三日、八月二十五日至九月四日。
- 梁白華譯：《阿Q正傳》，《朝鮮日報》第三面，昭和五年（1930）一月四日至二月十六日。
- 梁白華：〈文學革命에서 革命文學〉（〈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東亞日報》第十二面，昭和五年（1930）年四月一日。
- 梁白華：〈關於支那小說及戲曲〉，《每日申報》第一面，大正六年（1917）十一月八日。收於梁健植著，南潤秀（남윤수）、朴在淵（박재연）、金榮福（김영복）編：《양백화문집》（《梁白華文集》）第3冊，서울：강원대학교 출판부（首爾：江原大學校出版部），1995年，頁159-166。
- 梁健植：〈留學十年〉，《東光》第8卷，1926年12月，頁15-16。
- 梁健植：〈失敗珍談，내가 第一 창피하던 일—筆談하다 大失手〉（〈我最丟臉的經驗——筆談大失誤〉），《別乾坤》第11號，1928年2月1日，頁88-89。
- 梁健植：〈譯者序文〉，收於李斗星：《中國短篇小說集》，京城：開闢社，1929年，頁159-166。
- 鄭宣景：〈양건식의 중국신문학운동 수용과 번역의 태도〉（〈梁健植對中國現代文學運動的接受與翻譯態度〉），《中國語文學論集》第79號，2013年4月，頁417-448。
- 鄭振鐸：〈新文學之建設與國故之新研究〉，《小說月報》第14卷第1期，1923年1月。
- 김시준（金世俊）：〈한국에서의 중국현대문학연구 개황과 전망〉（〈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在韓國的概況及展望〉），《中國語文學誌》第4卷，1997年12月，頁1-8。

- 노관범 (盧官汎) : 〈1910 년대 한국 유교지식인의 중국 인식－柳麟錫, 朴殷植, 李炳憲을 중심으로－〉 (〈1910 年代韓國儒家知識人的中國認識〉), 《民族文化》第 40 輯, 2012 年 12 月, 頁 7-39。
- 박남용 (朴南用)、박은혜 (朴恩惠) : 〈金光洲의 중국 체험과 중국 신문학의 소개, 번역과 수용〉 (〈金光洲體驗中國以及介紹、翻譯、接受中國新文學〉), 《中國研究》47 卷, 2009 年 11 月, 頁 135-153。
- 박남용 (朴南用)、윤혜연 (尹惠妍) : 〈일제 시기 중국 현대소설의 국내 번역과 수용〉 (〈在日本統治時期中國現代小說接受與翻譯情況〉), 《中國語文論譯叢刊》第 24 輯, 2009 年 1 月, 頁 305-325。
- 박남용 (朴南用)、임혜순 (任惠淳) : 〈일제시기 중국 현대희곡의 국내 번역과 그 특징 연구〉 (〈日據時期中國現代戲劇的國內翻譯與接受〉), 《中國學研究》第 50 輯, 2009 年 12 月, 頁 429-459。
- 박진영 (朴珍英) : 〈한국 근대 번역문학사 성립의 기원과 역사성〉 (〈韓國近代翻譯文學史的成立的起源及其歷史性〉), 《탈경계인문학》 (《跨境界人文學》) 第 7 卷第 2 期, 2014 年 6 月, 頁 5-38。
- 박진영 (朴珍英) : 〈중국문학의 발견과 전문 번역가 양건식의 초상〉 (〈中國文化的發現及專制翻譯家梁健植的影像〉), 《근대서지》 (《現代書誌》) 第 10 號, 2014 年 12 月, 頁 192-220。
- 신남철 (申南澈) : 〈최근 조선연구의 업적과 그 재출발－조선학은 어떻게 수립할 것인가〉 (〈最近朝鮮研究的業績及重新開始——該怎麼建立朝鮮學〉), 收於신남철 (申南澈) 著, 정중현 (鄭鍾賢) 編: 《신남철 문장선집 I》 (《申南澈文章選集 I》), 서울: 성균관대학교출판부 (首爾: 成均館大學出版部), 2013 年。
- 장노현 (張魯鉉) : 〈근대전환기 중국 매개 번역문학의 현황과 양상〉 (〈現代轉型中的中國翻譯文學現狀與模式〉), 《국제어문》 (《國際語文》) 第 56 卷, 2012 年 12 月, 頁 321-345。
- 정래동 (丁來東) : 《정래동전집 (1)》 (《丁來東全集 (一)》), 서울: 금강출판사 (首爾: 金剛出版社), 1971 年。
- 정래동 (丁來東) : 《정래동전집 (2)》 (《丁來東全集 (二)》), 서울: 금강출판사 (首爾: 金剛出版社), 1971 年。
- 정문상 (鄭文祥) : 〈근현대 한국인의 중국 인식의 궤적〉 (〈近現代韓國

人中國認識的軌跡》), 《한국근대문학연구》(《韓國現代文學研究》第25號, 2012年4月, 頁203-231。

홍석표(洪昔杓): 〈胡適과 김태준의 문학사서술의특징—『백화문학사』와 『조선한문학사』를 중심으로〉(〈胡適與金台俊的文學史敘述的特徵——以《白話文學史》與《朝鮮漢文學史》為主〉), 《中國語文學誌》第22輯, 2006年12月, 頁159-190。

홍석표(洪昔杓): 《근대 한중 교류의 기원—문학과 사상 그리고 학문의 교섭》(《近代韓中交流的起源——文學、思想、學術之交流》), 서울: 이화여자대학교출판부(首爾: 梨花女子大學出版部), 2015年。